

# 提升教師專業操守 重塑教師專業形象



教育思考 李曉迎

教育局近日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顯示，局方在2019至2021年間接獲逾500宗有關教師涉嫌違反專業操守的個案中，有344宗與2019年社會動亂相關的個案。這反映出自反國教事件後，本港各中小幼學校不斷受到政治問題侵擾，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如何能將個人政治觀點、意識形態、對社會議題的個人看法與專業操守等方面作出平衡，從而達到特區政府所制定的教育目標，是一個需要特區政府持續關注的問題。

## 政府應起到主導作用

整合本港各媒體就失德教師議題的報

道，失德教師主要涉及學與教、師生關係、個人誠信、強行植入不恰當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等問題，其中涉及到學與教和政治與意識形態問題，則主要集中在教師傳播個人觀點與意見是否屬於教師專業判斷範疇。這個問題的本質與癥結是愛國教育遲遲得不到落實，需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视。

首先，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香港的教育系統關於「愛國」的本質一直無法進行定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會告訴公務員「愛國」屬於政治議題，需要公務員系統與教育界對「愛國」保持中立和平衡。但恰恰在香港「愛國」不僅不能高調，更要偷偷摸摸進行。政府曾有一段時間將「愛國」納入所高舉的政治中立範疇內，學校則將「愛國」視為教師在教學時特別需要留意和平衡的觀點。尤其是當有家長對學校推動愛國教育稍有不滿

意時，校長則馬上帶領教職員進行「自我反思」，討論是否「愛國」愛得過於高調？這種荒唐的論調直至今今天仍有人樂此不疲，更視為專業的體現。這樣不僅助長了反中亂港分子的氣焰，更是嚴重打擊、打壓愛國愛港教師的生存空間。

其次，在教師師德與教師失德議題上，政府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政府就師德議題所扮演的角色總給人感覺是一個旁觀者，而非是一個教育生態發展、管理的主導者。雖然就師德本身而言，確實反映在教師個人的修養與行為上，但是《教育條例》所賦予政府的職責也不應就此高高掛起，或將責任推給「校本管理」政策下的學校個體。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下，過往面對一些政治議題時連政府都有所忌諱，那怎麼能指望學校可以承受來自社會的壓力而獨立進行調查與懲處呢？且不說政治議題，就連近期有教師在課堂

上公然播放不當影片這類事件，學校都以影響校譽為由而選擇息事寧人，那麼像政治與意識形態這類複雜的議題又怎麼能讓學校自己解決？

## 應有清晰的專業操守標準

再次，教師師德的底線到底是一個動態的標準還是一個基本價值觀的體現？如果從學術討論或哲學思考的角度將教師師德視為單純的個人道德倫理問題，那麼將本地文化納入其考量範疇則無可厚非。但從行業或專業標準的角度來看，教師操守準則不應是一種模糊的、模稜兩可的描述，而應是直接、明確、高於個人觀點與意識形態的規範，不可有任何的討論空間。過去有教師在課堂上討論社會議題時，只要稍微將不同的觀點提一提，便視為做到了觀點平衡，政府本着對教師專業的信任很少加以干涉，但這種賦權本應建立在

一套清晰的專業操守標準之上，而非只是強調賦予專業判斷的高帽子。所以教師師德絕不是一個可以任意劃線、討論、泛泛而談的行業聯誼俱樂部章程，而應是一種基本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也要有清晰的標準。

總括而言，教師師德的建立與對教師失德的處理，所保障的不僅僅是教育界是否能落實特區政府的整體教育目標，更是在保護學生的福祉。「師者，人之模範也。」教師一言一行都會對學生帶來極大的影響，「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應成為香港廣大教育工作者與特區政府教師師德建設上永遠追求的目標。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

## 推動跨境醫療合作是大勢所趨

新聞  
背後

韋名

工聯會於過去兩個月，進行了一項跨境醫療需求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七成港人及超過九成內地港人支持香港與內地推動跨境醫療合作，並贊成特區政府資助在醫管局登記的港人，可以到港大深圳醫院等內地三甲醫院看診。

港人到大湾区內地城市生活已逐漸成為趨勢，然而，相關的政策卻明顯未跟上實際需求。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9年年底已有逾53萬名本港居民在廣東省逗留半年或以上，佔全港人口約6%。6%這個數字看上去不大，但其實並未完全反映出港人對內地醫療服務的需求。

工聯會早前訪問約900名市民，包括內地港人，其中超過一半是長期病患者，需要定時覆診，逾六成受訪者表示正輪候專科門診或手術，當中有四成人認為本港公立醫院輪候時間過長，亦有逾三人指出私營醫院收費高昂，難以負擔。另一邊廂，受新冠疫情影響，身處內地的港人可能無法如期回港覆診，特區政府早前推出了特別支援計劃，資助患者往港大深圳醫院看病，截至今年3月31日，港大深圳醫院已經安排了逾42000個診症預約，並為超過35000人提供了診症服務。從這兩個例子，都可以看出港人對內地求醫的巨大需求。

反過來說，這個現象也從一定程度上有力駁斥了一些人對內地醫療質素的偏見，其實在第五波疫情期間內地援港醫護的貢獻，就充分證明內地醫護的專業水平毋庸置疑，即使身處「客場」，他們仍能發揮出最佳表現。當香港繼續深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越來越多港人投身大灣區發展，可以預見對內地醫療的需求也會繼續增加。

然而，在如此龐大的潛在需求面前，跨境看病卻仍有不少現實中的困難需要克服。比如調查中，有約四成受訪者表示在內地求醫費用較高，主要原因是兩地病歷沒有互相認證，因此需要花巨額費用在重複檢查上；另有約25%受訪者則指出內地

沒有香港常用或合適的藥物。

有長居廣州的退休港人表示，雖然特區政府早前資助港人到港大深圳醫院求診的計劃可以照顧到其一部分醫療需要，但年長者可能不便於行，長遠而言難以應付來回深圳覆診，認為如果計劃能擴展至大灣區其他城市，對內地港人而言會更好。

## 跨境醫療需解決三個問題

簡單來說，現時跨境醫療面對的主要問題不外乎三個：缺互認、高費用、少選擇。特區政府日後改善或推出新政策時，亦應該針對這三點來作出調整。

首先是缺互認的問題，盡快促進兩地醫療病歷互認應是當務之急，如此可以省免重複檢查的必要和時間，也能很大程度上節省患者的支出。此外，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年公布《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其中提出「港澳藥械通」，允許在大灣區的指定醫療機構經廣東省審批後使用臨床急需、已在本港註冊的藥劑製品，以及使用臨床急需、本港公立醫院已採購使用的醫療儀器。特區政府應爭取就「港澳藥械通」涵蓋的藥物範圍作適當擴展，如此內地港人的常用藥物便能加快批核，不用兩地奔走。

其次是高費用問題，特區政府應檢討現時醫療券的適用範圍，可以考慮用作購買內地醫保，減輕市民負擔。另外，特區政府目前的特別支援計劃也需要恆常化，這樣一來，即便疫情過後，內地港人也能享受到相關資助，滿足其長遠需要。

同時，兩者的適用範圍亦可以擴大至大灣區內地九市其他三甲醫院，解決少選擇的問題。例如現時特別支援計劃主要針對的是需要覆診的人士，當局應考慮將之擴展至資助包括專科手術在內的服務，以便長期病患可以得到最適切的治療。

此外，特區政府亦可以資助更多本港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開設分院，這不單是為了造福市民，也是有效利用大灣區的機遇，進一步發展本地醫療服務，合兩地之所长，為兩地居民提供最優質的醫療服務，也符合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宜居宜業一流灣區的目標。



民生  
思路 姚潔瑩

行政長官林鄭月城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要研究降低《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強拍條例」）下的強拍門檻，以加快舊樓重建。根據發展局局長早前向立法會提供的最新數字，香港樓齡50年以上的私人樓宇有9162幢，其中有超過55%是「三無大廈」；樓齡達30至49年的有17868幢。另外，現時香港65歲或以上居民佔總人口20.4%，即每五個人就有一人65歲或以上。人口與樓宇同時急速老化，學術界稱這個為「雙老化」危機。

危機已經迫在眉睫，新一屆特區政府加快覓地建屋、精簡和優化土地房屋相關程序外，亦可以考慮提升市區重建速度，而提升重建速度的關鍵，就在於如何改變現時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自

有話  
要說

馮宣

區議會在本港地區行政及管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2019年的修例風波後，大批區議員因違反法例或相關規定而失去議席，甚至有部分被起訴正等待審訊，又或者逃離香港，地區行政亦因此面臨各種問題。

其實歷屆特區政府均曾經改革地區行政。例如在2007年，政府曾將社區參與計劃及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撥款審批權交給區議會，此後幾屆政府都延續這一措施。但在2019年區議會換屆選舉後，地方行政亂象叢生，部分區議會未

能正常運作，香港面對不能不解決的地區行政問題。

尤其一些大型地方發展項目，例如是觀塘「起動九龍東」和南區「躍動港島南」等，都是以地區為主導大型發展項目，當然也能夠配合香港整體旅遊和經濟發展。地區行政的優勢是「貼地氣」，穿梭大街小巷的問題也能得到適切的關注，在落實宏大的政策目標時可以不斷微調解決新發生的問題。

例如「躍動港島南」項目，早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就包括了將香港仔珍貴海鮮舫免費移交給海洋公園營運，成為南區的旅遊景點，本來是地區和旅遊業雙贏的方案。但最近有報道稱海洋公園在拖拉一年多後，改變原有接收的立場，讓海鮮舫只能夠繼續放在避風塘空

置，業主也不得不把海鮮舫拖離香港減低維修保養成本，實在令人惋惜。

如果我們有完備且高效的地區行政架構，類似珍貴海鮮舫的事件也許可以避免發生，地區行政可以更加積極主動介入協調海洋公園和海鮮舫業主的溝通，甚至在適當時候配合資源和政策。

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分區委員會成為選舉委員會成員的一個重要來源界別。分區委員會雖然有較細小的範圍組成，但歷史悠久，比區議會更早成立，大可以成立聯會，配合政府部門更加積極參與地區行政。地區上還有地區管理委員會，以往由區議會的委員會主席和各政府地區部門首長組成，分區委員會日後也可以互選出成員加入地區管理委員會，壯大地方行政，解決市民困難。

## 布林肯對華「民主牌」必然失敗



國際  
關係 宋魯娜

震驚世界的得州小學槍擊慘案僅僅兩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了所謂的美國對華政策演講。除了陳詞中國的發展是美國的威脅外，還宣稱未來決定性的十年要依靠西式民主。顯然這場慘案並沒有讓他意識到美國制度的問題所在。除了頻發的悲劇，透過今年西方各國的選舉，也再次顯示了這種制度的另一個弊端：贏者通吃。

贏者通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並導致嚴重的後果：一是不能從全國選拔和使用人才。二是任人唯親，賞近酬庸。

## 用人不問才能只問關係

一個國家的高端人才都是有限的，西方國家政黨林立，有限的人才本就分散。像法國就有數百個政黨。但政黨獲勝後又主要從自己黨內選擇人才，這自然很難保證官僚體系的質量還造成人才浪費——人才的最佳狀態和壽命也是有限的，閒置四年或者八年就有可能導致人才的退化和凋

零。而且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更換的做法，對政府的穩定性和延續性都造成很大影響。

以美國為例，每次政黨輪替牽涉官員的變動達4000多人！新人上手，需要時間進行學習，各團隊之間也需要時間磨合。等真正形成有效工作能力就又要政黨輪替。

與此有關的，則是任人唯親，賞近酬庸。候選人要組成競選團隊，人員構成自然都是來自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群體。勝選後，這些人也就從競選班底成為組閣班底。而其他凡是在選舉中做出貢獻的人，也同樣有大量的職務給予回報，如駐外大使。喜劇演員出身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勝選後，就把導演和編劇帶入政府。

所以這也造成一個普遍現象：專業化不足。美國歷史上最荒唐的一個任命就是海軍部長去海軍視察，竟然驚嘆軍艦不是實心的！當然就是最高領導人也可以是政治門外漢，政治素人特朗普並不是孤例。簡而言之，西方對權力的分配方式是贏家通吃，遊戲的輸家則一無所有。除了最高領導人享有退休待遇外，其他所有高官都成了失業者，要想生存就需要去重新找工作。

這種權力分配帶來三種後果。一是社

會的一流精英未必願意從政。這些社會精英都有自己可以依靠一生的事業，但如果從政，根據利益迴避規定，財產要託管，本人也得放棄管理的權力。等到卸任之後沒有退休金，即使想重操舊業，商機怕已不在，自己的知識儲備也恐怕都難再當重任。

二是由於高官沒有退休保障，所以他們自上任第一天就需要考慮後路。這就為各個利益集團游說提供了機會。西方所謂的「旋轉門」，其實就是雙方利益交換的包裝而已。像奧巴馬的國土安全部長傑伊·約翰遜卸任後則成為美國軍工巨頭洛歇馬丁公司董事會成員。「旋轉門」的奧秘無非是官員在任內利用權力向財團進行利益輸送，卸任後則獲得財團回報。

當然歐洲由於國家較多，也更複雜。像法國前總理菲永、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等離開政壇後都到俄羅斯能源企業任職。所以德、法兩國對俄立場和美國有很大不同不僅僅是國家利益不同。

然而「旋轉門」為包裝的利益一體化，給國家治理帶來一個嚴重的威脅：不能及時發現問題，只能等到紙裏包不住火！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如此。房利美與房地美住房貸款抵押融資公司問題早就被發

現，但在它們的游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吹哨者講話。最終等來的只能是危機的全面爆發。不過非常有趣的是，「兩房」原來是國有，是優質資產，後來轉為私營。等到危機爆發處於破產邊緣，就被部分國有化！也就是說掙錢的時候歸為私營，惹出禍端承擔代價之時就又到了政府買單。這背後得有多麼複雜的利益鏈條？

## 美國無視自身制度弊端

三是敗選者一無所有，除了東山再起，別無他法。但在野黨東山再起的唯一條件就是執政黨犯錯或者執政不力。於是身為在野黨全力阻撓和破壞便是最佳選擇。這也是目前西方政治體制日益敗壞的原因之一。西方政治極端化、黨爭不妥協化雖然原因很多，但這一贏者通吃的制度設計卻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實證的角度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西方選舉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才可選。即使偶爾出現負責任有魄力、敢於正視現實和注重長遠的領導人，也往往被選民選下台。如果選舉是選擇人才的最佳辦法，西方社會的各個方面如軍警、司法、大學、醫院、企業等何以都不採用？

西方這種模式的人才邏輯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選上去再檢驗。不勝任就在下一次選舉時進行更替。這種產生人才的體制和封建時代世襲皇權體制類似：如果運氣好，碰上一個好的總統，就能帶領國家進步。如果運氣差，則國勢立衰。克林頓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顯的寫照。只是治理國家不僅涉及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也決定着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命運。從這個角度講，把整個國家當成試驗品的西方人才邏輯顯然過於草率和不負責任。

從西方歷史看，它其實一直沒有解決好一個社會極為重要的人才選拔與任命問題。19世紀中葉英國借鑒中國科舉度建立現代公務員考錄制度之前，歐洲一直是貴族世襲。人才只能在有限的群體中產生。但是西方開始通過考試選拔人才之後，又逐漸實行一人一票、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精英可以不通過考試而是通過政治身份而掌握權力。其統治階層的選拔仍然是局限在極小的範圍之中，可說換湯不換藥。這就是西式民主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布林肯看不到自身制度的重大弊端卻幻想贏得競爭，只能是黃粱一夢。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